



浙江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丛书

浙江省市场型

村落的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陈修颖 朱华友 于涛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丛书

浙江省市场型

村落的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陈修颖 朱华友 于涛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省市场型村落的社会经济变迁研究/陈修颖等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04 - 6491 - 4

I. 浙… II. 陈… III. ①农村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浙江省②农村 - 社会变迁 - 研究 - 浙江省
IV. F327.55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5208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官京蕾

特约编辑 陈 兰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陈修颖，男，湖南长沙人，1965年10月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博士学位。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省级高等院校青年骨干教师，市政协常委。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研究所、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任人文地理专业硕士点负责人。在《地理学报》、《中国软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与实证研究》等学术专著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规划、区域经济。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浙江省 30 余个典型市场型村落的调查研究,系统地论述了市场型村落的经济、社会变迁历程。著作重点探讨了浙江省专业市场型村落的形成与特点、工业产品市场村落演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以及专业市场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副产品市场村落演化和变迁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生产资料市场推动村落社会经济变迁的特征等问题。作为市场大省的浙江省,专业市场对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对科学指导市场型村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封面设计: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陈敏尔 巴音朝鲁

李 强 盛昌黎 张 曦

成 员：潘家玮 赵光君 马林云 沈立江

侯靖方 黄旭明 陈仲方 金兴盛

杨建新 俞剑明 陈永昊 万 斌

郑仓元 侯玉琪 徐 辉 胡祖光

许 江 王建满 王永昌 黄坤明

孙文友 徐止平 厉志海 张家盟

蔡 奇 楼阳生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

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

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

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总论

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 方法与实践

王景新

(一)

把区域转型发展下沉到村域来研究是一个新领域。它既是区域经济学的新拓展和中国转型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又是“乡村社会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尝试。我们试图以村域经济社会问题及其转化机制的研究为主要对象，以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为样本，以中西部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作比较，运用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探索乡村研究的新框架和新方法。

本丛书是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RCC）承担浙江省历史文化研究工程“浙江近代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05WZT005）系列课题的最终成果。作者是系列课题总负责人，首席专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晓山教授。五个课题及主持人分别是：车裕斌教授主持的“浙江山区贫困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05WZT005-1）；李长江教授主持的“浙江现代农业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05WZT005-2）；朱华友副教授主持的“浙江现代工业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05WZT005-3）；陈修颖教授主持的

“浙江专业市场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05WZT005-4);作者主持的“浙江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05WZT005-5)。

实际上,本丛书涉及的样本并不局限于浙江省域,而是RCC近几年关于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从2003年开始,RCC先后承担了省部课题及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其中有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研究”(0330),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十一五’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对策研究”(04ZDZB17),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合作项目“发展与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苏、浙、沪三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招标课题“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和“转型时期长江三角洲区域空间结构重构组研究”(浙社规2005.5号)等。在本丛书送审、编辑的过程中,RCC又获得了“楠溪江中上游典型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系列项目07WHZT001Z)和“农村改革30年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JL037)等研究课题。正是这些课题的资助,支撑着我们在这个新领域艰难跋涉。

我们将研究视角刻意锁定在“村域”层面,其目的有三:其一是记忆乡村,用村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佐证我国农村转型发展的巨大成就及基本规律,展示其中的多样性、区域性和乡土性,为未来的研究留下历史记忆。我们认为这是乡村研究的第一境界。其二是解读乡村,尽可能克服个案、经验研究的局限,从整体或全貌上反映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的起点、历史进程、基础与约束条件、目标与路径、动力机制、不同模式和区域差异等基本理论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乡村研究的第二境界。

其三是服务和建设乡村，为政府决策和“三农”现代化提供理论和政策咨询。我们认为这是乡村研究的第三境界。显然，本丛书只是追求第一境界的尝试，离建立“乡村社会经济学”与“服务和建设乡村”的目标的距离十分遥远。

(二)

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核心概念。对此，我们在初步的研究实践中有下列基本认识。

1. 村落和村域

村落通常指农村社区和聚落。农耕社会的村落被视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地域，有着稳固的社区特性，有自助与合作的社会基础。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村落空间以及村落文化正在逐渐凋敝、萎缩或消失。在长江三角洲，富裕起来的村民追求自由空间，建造独体式、别墅型住所，居民点沿公路或集镇散开，自然村落边界越来越模糊。行政村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但村域边界明显且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客观存在，表明了行政村域资源、要素配置及管理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将村落边界规定为行政村范围，视为行政区域经济的最小单元，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村落、村域概念。

2. 村落类型划分

费孝通先生说过，“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费先生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做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

类型的定性分析”。^①为此，我们首先将村落划分为古村落、现代村落两大类，其中将古村落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类型不再细分，将现代村落再分为农业型、工业型、市场（产业集）型，贫困（少数民族聚居）型、旅游型五类。区分村落类型的标准：将农、林、牧渔产值超过30%、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作为农业型村落；将非农业产值比重超过80%，其中工业产值超过50%、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产业的作为工业型村落；而将产地和销售市场集聚一地的作为市场型村落。这样做可能并不科学，但至少做了“分别类型”的工作，为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

3. 村落类型的重叠或变异

事实上，纯粹的农业型、工业型、市场型、旅游型村落是不多见的，大多数村落并不是单一经济结构。农业型村落与工业型和市场型村落重叠，一些村落正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一些村落的工业化和专业市场高度发展，反过来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出现工农业相互促进的局面。市场型和产业集聚村落变异为工业社区或小城镇，一种路径是工业化催生了村落里的产业集聚，进而推动了专业市场的形成；另一种路径是先有市场而后有产业集聚，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带动了小商品加工业集聚。产业集聚与专业市场在一个村落里同生共存，推动了人口城镇化，一批批市镇涌现而大批“市村”却消失了。^②山区贫困型村落与农业型村落重叠，贫困村农业现代化

^① 费孝通：《农村调查》，新华网2005年4月28日。

^② 从1985—2001年，中国的村落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摘自李培林《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

程度低，很少有工商业发展，这是贫困的根源也是贫困的结果。古村落保护与开发也存在矛盾，保护古村落就是保护传统文明，但古村落同样需要发展：一些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并重，发展成旅游型村落，经济实力的壮大增强了古村落自我保护能力；而另一些单纯强调保护的古村落，依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经济实力弱小，古建筑岌岌可危，显现凋敝景象。

4. 村域经济社会转型

世界银行的专家把“经济转型”看成社会主义国家“试图重新建立市场经济并重新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之中”。^①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市场化、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化和国家现代化三重目标的叠加；村域经济转型与村域发展密不可分，与村落文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样密不可分。从狭义上理解，村域经济转型是自1978年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村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农民收入 and 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从广义上理解，村域经济转型包括农业产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经济结构由“农业—副业型”结构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型、农民收入由贫穷向富裕转型、生活方式由封闭向开放转型（“乡巴佬儿”市民化）、身份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社会结构由血缘村落向业缘村落转型、农耕文化（土地崇拜）与工商业文化融合。这样一来，不仅研究对象的时限起点向历史延伸了，而且研究内容也由村域经济转型扩展到了村落社会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村落经济社会变迁”与“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理解为同一概念。单学科研

^① 世界银行编写组编著：《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究农村问题难免偏颇，把村域经济社会转型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只有理解了村落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对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刻影响，才能解读同一经济区域和政策环境，为什么却存在巨型村域经济、发达村域经济和贫困村域经济的巨大差异。

(三)

梳理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渊源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村域经济社会转型研究有广博的理论来源和坚实的研究基础。

1. 转型经济理论研究

转型经济学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热点，成果丰硕。莫斯科大学布茨卡林 1995 年出版的《过渡经济学》使用了“经济转型”这一概念。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钱颖一经常在《转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世界银行的《从计划到市场：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了解转轨”、“转轨的挑战”、“人民与转轨”、“转轨与世界经济”等专题进行讨论。比利时的热若尔·罗兰是转型经济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专著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麻省理工学院, 2000) 全面介绍了转型经济学的两大基本理论：华盛顿共识和演进——制度学派，深入讨论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不同转型经验。哈佛 Philippe Aghion 教授称赞其为“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张帆、潘佐红翻译了这本论著《转型与经济学》(2002)。中国改革实践是孕育转型经济学的沃土，产出了一批重要论著，如盛洪的《中